

學術集林叢書

殷海光 林毓生書信錄

王元化主編



上海遠東出版社

王元化主編
學術集林叢書

IV

殷海光 林毓生 ●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殷海光
林毓生
書信錄

责任编辑 杨晓敏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殷海光 林毓生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16000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1—8500

ISBN 7-80613-035-7/B·23 定价:11.00 元

翰墨因缘念殷师(代序一)

林毓生

在《殷海光书信集》^①出版以后，我就辗转接到殷师母夏君璐女士在先师海光先生逝世后不久，托人带至香港友人处存放的，历年来我写给殷先生的书信。当时看到了这些信，真是百感交集。最初一封是二十多年前，在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在狮头山上海会禅寺中读书时写给他的。竟然经殷先生生前妥为保存，又经殷师母费心与殷先生的其他来往函件一起送到香港。我对此信早已忘却，现在原件居然又寄回我这里。二十多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殷先生逝世已经十年有余，世事与国事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而我自己也早已进入中年；但，在大学时代跟随殷先生那几年的读书生活，现在回忆起来，却仍历历如在目前。当时虽然对于身边所见之种种，深致愤慨；然而，精神却是无比昂扬与奋发的。主要是因为：在思想上，受到了殷先生的

^① 香港，文艺书屋一九七五年版。

启蒙，看到如何进展的远景；而在精神上，受到了殷先生那种特有的道德力量与精神力量的震撼，自然怀持着一种使命感，深深地觉得应该为苦难的中国尽一己之力。因此，青年人所易有的忧郁与寂寥的情怀，虽然有时也曾来袭，却从未被它占据自己的心灵。

一九六〇年我离台来美，转瞬已二十年。羁旅异邦，心情是寂寞的；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九年，殷先生给我的信可说是在羁旅生活中得到的最大的鼓励与支持。殷先生的信都是挂号寄达的，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有时中午或下午从外边回到宿舍，看到来自台湾的挂号信通知单，便知道一定是殷先生的信到了，心中立刻感到无比的高兴。马上放下别的事，骑脚踏车到邮局签字把信取出。先在邮局中打开匆匆看一遍，然后骑车回校园中，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再看一遍，晚上吃过饭，往往会看了第三遍以后才开始读书或写作。

我在一九六四年，因先严的身体不佳，而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一部分也可在台湾进行，刚巧海耶克师所推荐的奖学金可由我自由运用，并未限制要呆在芝大，遂返台住了半年。因此，得以与殷先生重聚。在台期间，殷先生时常邀我到他府上吃饭，每次只有我们师生二人，师母与师妹并不上桌。师母在厨房忙，师妹则负责端菜。每次我跟殷先生说，请师母与师妹一起来，他总是笑着答道：“她们忙，让我们先吃。”我提了几次，但毫无动静，以后也只好不说了。殷府的菜肴，鲜美而不奢，没有酒。往往我们刚开始吃了不久，就大讲起学问与世事来；每次我讲到他赞许或会心的地方，他就用筷子夹一块好吃的菜放在我的盘子中，以示奖励。这使我忆起大学二年级最初跟随殷先生读书的

时候,因为有许多问题要请教,问他是否有时间详谈,他约我在寒假期间每礼拜四下午两点钟到他家去。那时他与师母住在公家配给《自由中国》杂志社的宿舍内,与另外一家人合住一幢房子。他与师母的房间是一进门往右走,大约只有七八个榻榻米大,白天是书房兼客厅,晚上把被褥从壁橱中拿出,铺下来就睡在地板上。他的家虽然很小,但收拾得窗明几净,令人觉得甚为舒适。那时,师母正怀着尚未出世的文丽,每次我来,她把红茶或咖啡冲好以后,就出去散步;我们师生便开始对谈。当时我每次问到或讲到他赞许或开心的地方,他便把放在桌上从“美而廉”买来的小点心拿一块给我吃,我只得一边吃一边讲。那是民国四十四——四十五学年度寒假里的事情;当时大家都非常清苦,很少吃到如此精美的点心。这样的师生论学之乐,虽然事隔二十多年,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能清楚地记得。

和殷先生谈话是人生难得的境遇。他那低沉而富磁性的声音说起话来,隽语如珠,灵光闪闪,偶杂含意深邃的幽默突梯(但从未为说笑话而幽默),在辞锋犀利的分析中夹带着道德的热情与对中国与世界的关怀;他与学生相处,一向坦诚相见,和蔼若朋友然。但,与殷先生接触,无论过从如何亲密,彼此之间总有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距离感。殷先生是属于五四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国的思想革命贡献了一生,与师友学生交往也是站在这一个“公”的前提之下进行的。他欣赏或憎恶一个人,是与他觉得这个人对中国的前途是否已经或可能有所贡献有关。殷先生生活情趣高,道德想象深远,感情真挚而丰富,和他相处自然会感到浓郁的人情味与“奇理斯玛的”(charismatic)震撼。不过,这一切皆因彼此志同道合之故,极少有个人

“私”的成分。相反地，当他发现某人言行并不是根据他的了解所想象的那样，他便不能不视情况之严重性而与之疏远或断绝往来了。殷先生一生决不是没有可以批评的地方；但，他对生活与理想要求一致的努力所显示的光风霁月的道德境界，是令人景仰的。

殷先生逝世至今已经十年多了。现在每次想到再也见不到他，再也不能和他一起讨论学问、品评人物，再也不能接到他的论学感怀的长信，内心深处所感到的空虚与悲哀仍与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夜里于麻省剑桥听到他逝世噩耗时一样的强烈。像殷先生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再找到了！

自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接到我写给殷先生的许多封书信以后，心中不时浮起把我们的通信编辑出版的念头。但，由于我的工作甚为忙碌，以及其他种种思虑，这桩事竟然拖延至今，一晃儿，已经是四年多了。去年台湾出版界热心人士出版了印刷精美的《殷海光先生文集》上下两册，我为纪念他逝世十周年，也曾在八月中旬写就《在转型的时代中一个知识分子的沉思与建议》（后经《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在十一月廿四与廿五两日连载发表），就殷先生一生关怀的自由、民主、法治与中国文化的前途，提出了我目前的看法，希望能在思想内容与论式重要层次转折上，推进一步。现在为了追念过去跟随殷先生读书与论学的生活，以及其他的一些意义，决定把我们之间历年来的通信编辑发表^①。

正如看过我的中、英文论著的读者所知，我现在的思想内

① 在我给殷先生与殷先生给我的书信中，夹注号[]以内的话，都是原信所无，现在为出版本书，我所做的翻译或注释，其中一部分曾参考了《殷海光先生书信集》中卢鸿材先生及殷先生自己所做的翻译或注释。

容与思想方式和殷先生的论著所显示的,有相当的不同^①。(但,与殷先生为自由、民主、法治奋斗的志业,在大方向上则仍相同。)另外,当我重读我写给殷先生的书信以后,发现现在已不能同意我在一些书信中的见解。例如: Clyde Kluckholm的文化相对论,我在大学时代接触之后,心中颇为兴奋,可说当时是经由他的著作才渐渐进入人类学理论的领域;但,现在从博兰霓(Michael Polanyi)的知识论的观点去看,发现Kluckholm的理论相当肤浅。另外,在抵美以后最初写给殷先生的几封信中,对卓著成就的西方社会科学家,动辄冠以“大师”的头衔,这反映了当时颇受西方社会科学所提出的种种“系统分析”之镇慑的心情,而这种心情也意味着对当时国内支离破碎、迂腐而顽固的学术界的反抗。但随时间之流逝,心情也渐趋平静,我同时也逐渐研读了一些哲学、文学、神学与倾向人文的史学的典籍,发现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因受其基本假定的限制,对人间

① 例如: 殷先生多年提倡逻辑不遗余力;我现在则主张我们不应过分提倡逻辑(当然,也不应故意加以排斥),而且要清除对“科学方法”的迷信。相反地,我们要特别注重根据对相关问题具体的了解而做的实质思维。因为逻辑与“科学方法”所能接触到的只是形式问题,如果我们对问题本身没有具体而实质的了解,一个人无论逻辑如何精通,往往会根据对问题片面的了解加以演绎,自然要犯形式主义的谬误。犯了形式主义谬误的人,却不自觉地以为他根据形式建构所得到的“了解”是实质的了解。形式主义只是头脑中的逻辑建构,但形式主义者却以为这种头脑中的建构实有所指。举例而言,罗素在国内盛行数十年,我在大学时代也曾对他心仪,看了将近十本他写的书,当时在同学中竟被认为是罗素“权威”。其实,我们当时对罗素的崇拜,并不是由于对他所谈的问题有了实质的了解,发现他对这些问题所提出的理论的确具有深刻见地的缘故。罗素在社会、政治、文化几方面所提出的见解,多年来在国内之所以如此受到欢迎,我想可能与一些人对逻辑与“科学方法”产生了迷信有关,我们以为他是逻辑大家,懂得“科学方法”,应用“科学方法”所得到的见解,当然是正确的了。其实罗素对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见解,在许多方面是相当肤浅,甚至不通的。

事物的了解实在是有限的。我在这里，无意否定西方社会科学应有的地位，但要提醒大家：在攻读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之时，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被其术语(jargons)所眩惑，同时我们要探讨它的基本假定与表面上看去颇具系统性的理论的关系。当然，在我们研读人文学科的著作之时，也要应用这个态度。

然而，现在在这里既是发表过去的书信，当然要存真；唯一要求读者的是：请注意每封信撰写的年、月；信中内容表示的，是我当时写信时的思想与感受，并不一定与我现在思想与感受完全相同。我的思想内容与思想方式的改变，是大学时代以后，近二十年来读书与思考的结果；但，我的思想基本取向则始终未变。二十年来，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可说是在极不稳定、极为浮泛、上下翻腾的情况之中。从右至左(甚至从极右转到极左——这两者之间，距离可能最短)、从左至右、从中间转到偏左、从中间转到偏右，各式各样的转变都有。与这些形形色色的思想转变相较，我的思想取向，从大学时代受到殷先生的启蒙，开始服膺理知的自由主义以来，至今一贯未变。这一点我想是可以告慰先师在天之灵的。

自由主义在西方正面临着许多危机，此处无法细述；而它在中国是否能够逐渐实现，落实地说，一向相当渺茫。自由主义认为人是价值的来源；个人为一不可化约的价值，所以不可化约为别人的工具。这种人的尊严，必须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有了人的自由，才能有人的尊严；而为了保障人的自由与人的尊严，则必须建立民主与法治的制度。这些，只要我们根据理性与爱心确认它们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就不能说它们不是我们的理想，除非我们愿意自相矛盾。不少中外知识人都会犯一种毛病：

在理想屡受挫折，悲愤填膺，痛心疾首之时，便怀疑自己的理想之正确性；然后，不是找寻一大堆理论彻底毁灭自己的理想，便是变得玩世不恭，或投身至一套假理想以补内心之空虚，或变得心灰意懒百事消沉。事实上，这些现象往往是，自己的罪恶感——因承担不了自己的理想——而导致的精神分裂。然而，真正的理想向来是很难实现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应斥之为孤高；既然找到了终极关怀，自然可以安身立命，择善固执。何况民主与法治的实现，实质地说，是一程度问题。只要真心觉得它们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我们就应继续不断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能做多少，是多少。这不仅是为了保持自己思想的完整性，从实效的观点来看，只有执著自己的理想，才有希望切实找到它的某种程度之实现的方法与步骤。

〔我寄给殷先生的信大部分都没有留存副本，今天能在这里与殷先生寄给我的信，按通信之次序一起编排发表，是得自殷师母夏君璐女士与尚未谋面的卢鸿材先生之赐，谨此致谢。〕

殷海光先生

对我的影响(代序二)

林毓生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最初是由台北狮谷出版公司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后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在一九八四年曾发行再版。这本小书今天得以与大陆读者见面，笔者内心甚觉快慰。此书主要收集了我在一九六〇年负笈来美后与先师殷海光先生之间的通信。殷先生是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不幸以胃癌不治逝世的。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写的，我给他的最后一信是在那年八月十四日写的。我在一九五四——一九五八年就读台湾大学。一九五五年秋季，由于上殷先生讲授的逻辑课的机缘，开始跟随他读书、思考问题。在台湾时，也曾与殷先生通过几封信；但这里收入的，只有一

封经殷先生生前妥为保存，我于一九五七年暑假，在台湾狮头山海会禅寺自修时写给他的信。我在离台来美时，曾把他给我的几封信放在行篋中，最初几年还时常看到，后来搬了许多次家，非常遗憾，那几封信就怎么也找不到了。所以，在我来美之前，殷先生与我的通信，就只能收入我给他的那一封了。

这本《书信录》最初之所以能够在台湾出版，不能不特别感谢殷师母夏君璐女士。如果她未曾在殷先生逝世后不久，把我历年来寄给他的信与他的其他来往函件一起托人带至香港友人处存放，后来又经这位友人把我给殷先生的信寄还给我；那么，能够发表的则只有我保存的殷先生给我的信了。美国胡佛研究所档案馆(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已经正式成立“殷海光档案”。该馆曾来信表示，希望我把殷先生与我的通信原件赠与他们，由他们保管。我已同意，近期内将寄给他们。

二

一九四八年年底，我随父母从北京移居台北，当时我十四岁。在北京时，就读师大附中，至初二上。到台北后，考插班，进成功中学初二下就读。高中时，改读台北的师大附中。这正是“白色恐怖”很严重的时候；不过当时年纪小，并没有感觉到什么。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一件间接有关的事。我在北京时，已养成喜读课外书的兴趣，常在中午的休息时间去学校附近的琉璃厂逛书店。在台北读中学时，有一天在国文老师家里看到他有鲁迅的《呐喊》与《彷徨》。我因在北京时，已看过其中收

录的一些作品，但未曾看完，遂跟老师说是是否可借给我拿回家看。老师欣然同意，但却很仔细用看过的《中央日报》把封面与封底包好后，才让我放在书包中，并嘱我阅后即还，不可借给别人。现在才知道，这种借阅禁书的行为，如被治安人员知道了，是很严重的事。

我在中学时代，已经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意识。因为喜欢阅读五四人物的著作，已经了解了一些近现代中国悲惨的历史经过及其由来。对同胞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常思将来当尽一己之力，设法改革中国的种种缺陷，以便同胞们可在将来生活得合理、富足、有尊严。当时知识有限，但在阅读报章杂志与能找到的有关著作以后，曾直觉地感到：在许多待决的中国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治领袖的素质问题。因为没有真正有理想、有能力、有见识的政治领袖，而政治领袖的影响力比谁都大。所以别人在其他方面的努力，即使有一些成就，也被中国现代自私、无能与愚陋的政治领袖所抵消泰半。（我这样的想法，与许多和我同时代的青少年往往以为服从政治领袖的指示并对他的言行表示崇拜，乃是爱国的行为，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为什么我会在中学时代就有这样的爱国思想，除了受到一些五四人物的启蒙，自己努力独立思考以外，对我而言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既然如此，中国将来的希望在于像我这样自知确实具有道德热情、公正心胸与相当不错的才智的人，应该出来从政，最好将来能成为国家的领袖，这样国家才真正有希望、有前途。当时，年纪轻，不知天高地厚，加以受到了曾国藩《原才》之类文章的影响，以及从小学起常被老师指派或被同学推举担任班长、学生会主席，使自己以为颇有领导众人的能力；所以，在我少年的

心灵中,遂有这样当仁不让、很令自己感到兴奋的想法。(因为怕别人会以为我大言不惭,过于天真,所以除了家人与一二知交外,从未向别人道及。)

我最后在大学里念历史系,主要是希望从历史中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以及得到对过去政治领袖们的得失的深入了解,以备将来为国家做大事之需。我是怀着这样的雄心壮志迈进台大的。可是,进入台大以后,接触到下述几个现象,使我感到很茫然:

(1) 台大历史系的师资,号称集过去北大、清华与中大(中央大学)三校史学系教授的精华。但,他们的课程(除了少数例外)大多相当琐碎,主要是考证史实。考证史实——尤其是考证重大事件的史实,当然有一定的意义与贡献,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工作。不过,不是每一事件的考证都有相同的意义。当时台大史学系的师长们的考证工作,许多失之于屑琐。然而,他们却以为学问而学问来辩解他们工作的价值,特别强调追求真理不可渗入世俗的、功利的考虑;并举科学史上当初看来是琐碎的研究,后来变成重大发现的例子,来说明他们的工作的意义。我对这样冠冕堂皇的说辞,心中甚感不安;但当时却想不出令人信服的论点来反驳他们^①,只是觉得这样下去,我自己研读历史

① 一直到数十年后我写《中国人文的重建》(1982)最后一节,论析考证工作,无论本身做得如何精密,不可能提出重大而原创的理论性问题的时候,这项心中的不安与困惑,才终于得到纾解。(如果我们要对人文与社会问题谋求较彻底的解决之道;那么,我们就必须找到一套系统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系统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建立在对人文与社会现象的系统性了解之上。而只有在对人文与社会现象提出了重大而原创的理论性问题以后,我们才可能对其进行系统性了解。这种工作当然必须建筑在确实可信的材料之上;所以,考证工作有时可能发挥关键性的功效。(见下页)

的目的——找出中国病根的基本所在——便难以达成了。

(2) 当时大学入学试,已经开始实施联考制(全省考生共同参加一次考试,录取的考生根据其填报志愿的先后与考试成绩的高低,被分发到不同学校、不同科系中去)。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下,绝大多数的家长都鼓励,甚至强迫自己的子女报考实用、毕业后易谋出路、不易牵涉到政治问题的科系(医、工、理、农)。不少文科生由于成绩不够好,无法被分发到实用科系中去,乃是根据其第二或第三志愿,被分发到文学院来的。对许多文学院的学生而言,因为本来就不打算攻读文学院的科系,现在却又勉强就读了文学院的科系,而社会上的舆论又一致认为读文学院是没有什么出息的,所以他们的精神甚为消沉,心情很是萎靡。

校园中弥漫着非常现实的气氛。再加上蒋氏政权鉴于在大陆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未能有效地应付自五四以来一脉相承的,为民主与科学奋斗的学生运动;它到台以后便使用其威权结构中可以使用的一切办法,尽量把对五四的记忆从知识分子的心中抹去。另一方面,蒋氏政权则利用传播媒体,制造“反攻大陆”的神话;在这个神话中,蒋介石被塑造成为“世界上反共的精神领袖”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救星”。

这些政治宣传主要是在校园之外进行的。它在台大校园之内虽然并未过分猖獗;但,在五四的传承已经被扼杀的背景之

(接上页)但,考证工作本身,却无法取代这里所说的,在学术研究的规矩之下的理论性工作。不过,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不是每一项理论性的工作都必然是正确的。换句话说,不是每一项理论性的工作都是值得做的。)此文已收入拙著《思想与人物》(台北:联经,1993年第8次印行),第3-55页;《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1992年第2次印行),第3-42页。

下,这样的宣传,配上“白色恐怖”的阴影,使得同学们对政治变得冷漠。许多文学院的同学是以上课抄抄笔记,课余看看武侠小说来打发时间。另外,一些心灵较为敏感的同学,则变得玩世不恭,以调侃打诨度日。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极少数的同学可与谈外,对我这个在中学时代已经看过一些五四人物的著作以及外国(尤其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非常关心政治,心中经常被许多有关宇宙、人生、国家、社会与文化的问题所困惑的青年而言,台大文学院是相当荒凉的。

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在一九五五年秋季开始上刚从哈佛大学访问归来的殷海光先生的逻辑课。

作为纯学术研究的逻辑,本是中性,并不涉及价值问题,本身也没有任何政治意涵。逻辑学者的学术研究与他的政治立场也无必然的关联。但,殷先生却把逻辑讲成使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他讲课时,非常有条理,庄严而不拘谨,在词锋犀利的分析中,夹带着道德的热情和对中国与世界的关怀。他服膺五四初期所鼓吹的自由主义,常喜征引艾克顿公爵的名言——“权力使人腐溃,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溃”——来说明中国现代史的病根之一是没有办法限制与监督政治权力的扩张与滥用。他认为,引进英美文明发展出来的自由的价值、人权的观念、民主的制度与建基于经验的理性,才是中华民族应走的康庄大道。殷先生时常慨叹,早期五四精神与风格在台湾的失落;而重振五四精神,彻底实现五四早期所揭橥的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目标,乃是救国的唯一道路。

在荒凉的校园内,茫然的心情下,听到了殷先生那样的宏

论,对我而言,真是空谷足音!

于是,在课后向他请教治学的途径。殷先生知道我已看过一些五四人物的著作,觉得在当时相当难得,很乐意指导我。他说: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现在(五十年代)的水准,只能表达一些零碎的意见,系统性的、深入的理解,尚待将来。他自己由于成长过程中颠困流离,以及后来在报纸杂志上秉笔报国,花去许多时间与精力,所以尚未积累足够的资源做最根本、最艰深的研究。不过,他积数十年观察与思考中国问题的经验,以及研读当代西方哲学的心得,可以提供两项协助。第一,他有鉴别能力,可以提供学术的标准。可以告诉我什么著作言之成理,见解深刻;什么著作肤浅,不值一顾。^①第二,他可担任交通警察。他说:“你这一生要做什么,当然由你自己决定。不过,你一旦决心要研究你关心的问题,我可告诉你往哪个方向走,才是避免走冤枉路的正途。”

我禀告殷先生,自己攻读历史的最大志趣是希望彻底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当时未敢告诉老师,我最大的志趣是希望自

①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日殷先生给伍民雄的信上有类似的话:“我所能做到的,是勉力做个好的启蒙人物:介绍好的读物,引导大家打定基础,作将来高深研究的准备。我常向同学说:‘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见《殷海光全集第十册·殷海光书信集》,第225页。)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殷先生在答覆卢鸿材请他写自传时,说:“关于要我写自传的事,我简直不知怎样答覆弟才好。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说极有价值,也可以说极无价值。就纯粹的学术来说,我自问相当低能,丝毫没有贡献可言。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则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直到今天为止,我在思想上积累的建树还少得可怜,可是我抖落的东西够多了。若干人是把我极力抖落的东西穿上玄学的新装来出售。真是又糊涂又无知!我的思想困苦成长于中、西、新、旧交会而又冲突的际会。……”(见前引书,第320—321页。)